

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编

杨贤江 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浙江大學出版社

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课题

杨贤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编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杨贤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责任编辑 傅百荣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5

插 页 1

字 数 238 千字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书 号 ISBN 7-900662-69-3/G·81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杨贤江(1895—1931)是中国早期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学生运动领导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述教育基本理论,分析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他广泛介绍并导入欧美、日本及苏俄的教育理论和制度,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国后,杨贤江始终是受到国内外教育学界关注的重要历史人物。改革开放以后,在叶圣陶、胡愈之、吴亮平、李一氓、夏衍等老一辈教育家的倡导下,在胡乔木同志的支持下,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于1984年成立,先后组织开展了杨贤江诞辰及逝世纪念会、专题研讨会、学术成果评审会等学术活动,编辑出版了《杨贤江纪念集》、《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杨贤江传记》、《杨贤江全集》等,极大地推动了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2001年3月,我会与慈溪市人民政府、宁波市教育学会、中国在日本学人教育研究会等单位在杨贤江的故乡慈溪市联合召开了“杨贤江教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以及日本几所大学的教授和中国留日学生代表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成为近年来我会组织开展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

为了进一步推动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我会决定组织编辑出版一部既能反映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又能反映杨贤江故乡宁波地区多年来在学习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推动教育改革、深化素质教育、创建示范学校经验和体会的论文集,以期深入发掘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努力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杨贤江教育思想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转化为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思想资源。论文集以“杨贤江教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宣读发表的论文为主体,同时收集汇编了近年来发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此外,还选译发表了日本著名教育学家斋藤秋男先生著作中的部分章节,以纪念这位前辈学者对杨贤江教育思想及中国近现代教育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论文集的编辑工作由宋恩荣、田正平、肖朗、朱浩东负责,自始至终得到了我会顾问潘懋元教授、全国老一辈学者专家以及宁波市教育局领导的热情关怀和支持;论文集的出版则得到了慈溪市人民政府的宝贵资助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水平,论文集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国内外学者、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

2003年3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杨贤江与中国近现代教育

- 杨贤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 斋藤秋男(1)
- 杨贤江“新教育”理论形成阶段…………… 任钟印等(6)
-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部分资料来源考证
- 兼及杨贤江教育学原理研究的两个误区 …… 杨 晓(33)
- 杨贤江的教育史观探析 …………… 吴洪成(44)
- 杨贤江与诚意学堂 …………… 杨国君等(55)

第二部分 杨贤江与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

从《杨贤江全集》看欧美、日本及苏俄教育的导入

- …………… 肖 朗(65)
- 杨贤江和日本 …………… 朱浩东(73)
- 杨贤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 …………… 周谷平(89)
- 杨贤江与苏俄教育的导入…………… 冯秋香(104)

第三部分 杨贤江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及发展

素质教育思想的先驱

- 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 潘懋元(120)

“全人生指导”

- 本土化的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 宋恩荣(124)
- 知识·教育·社会
- 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对素质教育的启迪
- …………… 庞守兴(137)
- 论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教育思想…………… 倪心刚(149)
- 浅谈对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教育思想的认识…………… 徐建萍(160)
- 杨贤江论国民素质的提高与教育革新…………… 范庭卫(167)
- 论杨贤江的教育创新思想…………… 王 剑(178)
- 试论杨贤江创造理论及其对当今教育教学的指导意义
- …………… 陈靖晓等(187)
- 杨贤江的学习思想…………… 陈德安等(201)
- 杨贤江与学习法…………… 长谷川丰(222)
- 杨贤江论教师修养…………… 赵俊杰(229)
-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 杨贤江教师观述评…………… 崔伟鹏等(238)
- 拳拳报国心 满腔爱民情
- 论杨贤江的师德观…………… 鲁系楚等(245)
- 实践杨贤江教育思想 整体推进素质教育…………… 林汉音(256)
- 弘扬杨贤江精神 创建示范学校…………… 张光锋(263)
- 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 注重成人道德教育…………… 金仁乔等(274)
- 充实生活 圆满人生
- 学习杨贤江关于学生闲暇教育思想的体会与实践
- …………… 陈 新等(280)

第一部分 杨贤江与中国近现代教育

杨贤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①

斋藤秋男

(日本专修大学)

一、共产党员杨贤江的生平

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蒋介石政权初期,有一位名叫杨贤江的共产党员,他致力于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他以自己担任主编的《学生杂志》为舞台,奋笔疾书,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此处仅就其经历和活动的主要足迹加以介绍。

杨贤江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一个裁缝家庭。1917年毕业于地处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正值留美归来的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推行他的教授法改革。1920年9月,转任广东省高要县^②新成立的国民师范补习所的教务主任,无奈因为粤桂军阀混战,该补习所终究没有办成,遂返回上海。1921、1922年前后,杨贤江开始潜心于杂志的编辑工作。刚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十分重视青年团的工作,《中国青年》杂志也于1923年创刊。该杂志的负责人就是五四时期的活动家之一——恽代英。杨贤江在与恽代英的接触过程中加入了共产党,并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在此前后,他开始担任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学生杂志》的主编,编辑工作一直持续到1926年。所有在这些杂志上所发表的论述,后来都成了作为他的教育论之集大成的

两本书——《教育史 ABC》(1929 年 5 月刊)和《新教育大纲》(1930 年 1 月刊)——的基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贤江开始转入地下活动,为避免遭受迫害,他于 1927 年末东渡日本。在日本的大约 1 年半时间里,杨贤江一边翻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日本的教育状况,一边撰写《教育史 ABC》。1929 年 5 月,他返回上海,继续写作、翻译,并撰写完成《新教育大纲》。1931 年初,杨贤江肾结核恶化,为了疗养再度去日本,不幸于同年 8 月病逝东京,年仅 36 岁。

二、批判资产阶级教育与“圣职”论

在怎样看待其同时代的教育家的问题上,杨贤江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新教育大纲》在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部分时,他把蔡元培在民国元年时提出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放上了案板”。蔡元培说:“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他引了蔡元培的这一段话后,讲道:“这虽是蔡氏在民国元年所持的见解,到了此刻‘党国时代’,也许有了一些改变;但教育超轶政治的这种见解,委实不能不视为极普遍的一种见解,所以我们还有加以批判的必要。其实,据我们在前面所述各节,教育没有不隶属于政治者。就是‘共和时代’(大概是指法国革命后的市民国家时代)的教育,也决没有超轶政治的。”^③

接着,他列举了欧美教育历史上的一些事实,更以昭和初期的日本为例,阐述了日本的支配阶级为了推行对教育文化的统治以及对无产阶级的文化压迫,他们是如何以压制大学的自由为中心,并且用尽了一切的方法和手段,即从所谓高级文学起,一直利用到《浪花节》《安来节》^④之类,尔后,他又做了如下论述:

“我们由以上所举日本的例子,可知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是怎

样地与一般政策紧密结合了。在文化所及的范围内,无处不跟随着政治的势力;其紧密的程度直如形影之不容分离。如再有人说近代教育‘得以超轶政治’,或者有人相信办教育可以不问政治,老实是不可通的。”^⑤

这里所谓的有人,前者指蔡元培,后者虽然没有指明是谁,但1926年陶行知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执笔的《我们的信条》,正是它受到了批判,这却是明摆的事实。

杨贤江“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五大教育特征,它们是:(1)教育与劳动的分离;(2)教育权从属于所有权;(3)专为支配阶级的利益服务;(4)敌对(阶级)教育的对立;(5)男女教育的不平等。

让学生和教师各自结成自身的团体,让学生和教师加入政党,这些都是他从1923至1924年以来在《学生杂志》上所表达的一贯主张。当时,在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青年人不应该参与政治,这是极为普遍的风气。在这样的情况下,杨贤江的这一倡议引来了读者的踊跃投稿。特别是在教师界,“教育救国论”之类隔绝教师对政治的关心的论调是占主导地位的。他在《教育史ABC》中展开的教师论把“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放上了案板”,进行了如下的批驳。

“从没听说过政治神圣、文艺神圣,或者经济神圣、社会神圣,只有所谓的教育神圣,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义务性、强制性的教育,这决不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只不过是使国民的劳动力能够适用于它的经济组织而做的准备罢了。所谓神圣也好、清高也罢,都把教育视为万能加以迷信。在资本主义国家,万能的不是教育,而是私有财产,只有私有财产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把教育的工作视为‘清苦’,或者是‘高贵’以至于达到迷信的地步,其影响在于,第一是隔绝了政治,第二是隔绝了劳动,第三是给那些在政治舞台上不得志的政客以一个暂时安身

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自己起身告退的地方求教育,由政客摇身一变而为‘学客’,借办教育之名,行培养党徒之实”。^⑧

三、作为理论斗争之武器的教育论

他的《新教育大纲》中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一节,主要围绕以下一些论题展开论述。

A. 社会主义社会的概观,B. 马克思的教育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C. 过渡时期内教育的性质(它仍然是阶级的教育,但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等问题。

由于《教育史 ABC》、《新教育大纲》这两本书的发行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禁止,它们是在很多教师与学生的传抄过程中被阅读的。

1961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校订、重版了《新教育大纲》,指出杨贤江用李浩吾的笔名所提出的论点“以大量切合实际的、丰富的材料展开,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着极为重大的战斗意义”;这里所论述的“理论与事实,虽然有一些东西与当今的实际情况已经不能完全相合了,但是其基本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是我们这些研究教育史和教育学的人所不能不了解的”。发行者正是这样叙述重版的原因的。

最后,简要地摘录一下《新教育大纲》初版的《序言》,从中可以看到一个逝世于三十六岁的活动家的气魄。

“在我心目中,我是拿这一类的青年做对象,要向他们讲些关于教育的话;所以这不能是本专门的著作,也不能是本极有体系的《教育学》。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年轻的各位读者可以获得一个对教育的正确认识。同时,在我心目中的这样的青年读者,还该是个有志于社会变革的工作,而希望获得新兴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期能把握理论斗争上的武器,以应用于实践中的。

所以凡有初中毕业及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无论是在学的或

失学的，是就业的或是无业的，是有志于教育工作的或不是的，特别是高中师范科学生，小学教师，一部分的大学教育系学生及中学教师，我都希望他们来读一读这本通俗的教育书。

这本书的大部分资料，与其说是学术的研究，毋宁说是暴露的实话。在这个时代，‘暴露’正是一种必要的且是有力的武器。让我们拿这个武器来揭穿教育上的把戏吧！

一九二九，一二，二七，于上海。

李浩吾”^⑦

注释：

①本文篇名及注释为译者所加。

②今广东省肇庆。

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合编：《杨贤江教育文集》第 542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浪花节》《安来节》，都是日本的通俗曲名。《浪花节》又称《浪波节》，浪波即大阪，该曲源出大阪；《安来节》源出出云国的安来町。

⑤《杨贤江教育文集》第 552 页。

⑥原文如此，然查《教育史 ABC》一书，未见此段文字，疑为讹误。

⑦《杨贤江教育文集》第 406、407 页。我国自“五四”运动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为新兴社会科学，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

（选自梅根悟监修《世界教育史大系 4·中国教育史》，日本讲谈社 1975 年版，叶志坚译）

杨贤江“新教育”理论形成阶段

任钟印 喻本伐

(华中师范大学)

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中所确立的“新教育”理论,是其思想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是他创新精神的典型体现。文本试图在理清杨贤江教育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其教育理论的形成划分为若干阶段,以利于审视及分析其拾级而上的心路历程。

一、教育救国论(1912—1919)

教育救国思潮是中国近现代最有影响的教育思潮之一。杨贤江在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受当时社会思潮和师友的影响,很快成为教育救国论的忠实信徒,如此立论的依据,主要有如下数端。

(一)此期所崇奉的人物

分析杨贤江的性格特征,可以发现,他具有丰富的宗教潜质。这表现在:他对信仰的渴求;他对理念的信守;他对践履的严格;他对同胞的宽厚。应该说,他似曾有过皈依佛门之念;父亲之所以担心他出家,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至于他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亦可从他当时所崇拜的谢洪赉身上折射出景仰、亲密之情。若探究他最终未能投入宗教怀抱的原因,则可从坚信教育救国方面找到部分答案。

1915年4月4日,春和景明,杨贤江偕学友8人午后出游西湖昭庆寺,见该寺香火炽盛,乡民来此顶礼膜拜者甚多,便由此发

生联想：“异日我国之教育，社会若能信之若是，吾见我国必富甲一世矣。”^①这种企盼，既典型，又自然，它发端于宗教的氛围之中，难免不披上一层宗教的轻纱。

宗教信仰与偶像崇拜密不可分。杨贤江学生时代最景仰的人物，既不是孙中山，更不是袁世凯，而是较早提出“新民说”的梁启超：“到杂志阅览室阅《大中华》，登有梁任公先生最近肖像。先生面貌端方，目光炯炯锐利，气象和平中有沉毅，余不禁反复玩味，不忍释手，举其耳目口鼻悉入我脑海中，可以永远不忘也。余之倾倒于先生者极矣！”^②

此期杨贤江爱不释手的读物，为梁启超早年主编的《新民丛报》。该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专治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之病。杨贤江或节录，或札记。这既与杨贤江对梁启超的景仰有关，更与该报所标揭的教育救国论关系密切。

当他从《新民丛报》上读到“青年意大利党”创建人马志尼所撰《少年意大利会约》时，特别赞赏并节录了如后警句：“凡为事必有信仰，有信仰仍有希望，有希望而事可成。”^③若论浙江一师时代杨贤江的信仰，舍教育救国则无从谈起。

（二）此期所立定的志向

相对于信仰而言，志向更明确，也更易于把握。此期杨贤江的择业倾向，更能反映他的教育救国思想。

在师范求学时，杨贤江始终以毕业后充当小学教师为己任。他深知：“造就良好之国民，促进一国之文明，小学教师实肩其初基。”^④他曾对父亲明确表白：“男无他志，在今为师范生，将来为小学教员，惟期教育此辈之儿童，使之为一国之增光者耳。”^⑤

杨贤江任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始以做一“理想之学监”为抱负，寄望于“大扬宗风，盛德服远，移风易俗”。^⑥继以专攻教育学术为志，入教育科旁听，并萌弃职报考教育科之志。后“更兴留东入

学高师之念”，计划归国后执教于暨南学校，献身于华侨教育。此志又系教育救国思想所使然。

他在1918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爪哇华侨占当地人口百分之八十，然侨民教育不足，知识不开，多数与马来土人结婚，居常习俗全同土民。最可异者，不说国语及以不能马来语为耻，以致国性丧失。今欲图补救，舍教育之力又何求？吾国多有极好之基地，可以大事活动，如国内之富源，国外之商权，苟得善经营者设法振兴，前途盛况宁可限量！然今尚少人注目于此，是可惜也。”^⑦

此后，杨贤江坚辞南高师教职，赴广东肇庆就任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这次人生抉择，实为其舒展教育救国怀抱的又一尝试。师范补习所是直接培训小学教师之地，“故我个人很愿竭我能力，来造就这班师资。因为我相信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须从小学做起”。^⑧尽管战乱使此志终成泡影，但驱使其南下的思想动力却是值得注意的。

客观说来，认真事教者，未必都崇奉教育救国；但信仰教育救国者，必认真事教。杨贤江无疑属于后者。

（三）此期对政治的态度

在学生时代，杨贤江所经历、所关注的最大政治事件，莫如“二十一条”之签订。1915年5月5日，报上揭载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而发最后通牒后，杨贤江的忧国之心见诸于当天的日记：“晚上阅报，中日交涉已届最后之期，且有谓日已下‘哀的美敦书’于我者。呜呼！惊耗频来，正卧薪尝胆之秋，顾人犹是嬉戏也，且出汨没良心之语，曰中国真弱，中国人真倒运，一若秦人视越人之漠不相关者，吾不知其究竟知国家否？究竟知中国之即我之国家否？何彼之不切己着想如是也？”^⑨连珠炮般的诘问，是以如后的感叹权作答案的：“呜呼！教育之效果乃竟如是，吾不知将有何言矣！”^⑩这又是教育救国思想的典型表现。

当年轻气盛的爱国学生带头冲破这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时，

杨贤江却对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行动持保留意见：“上午第四时，习字班诸师劝励我侪，谓国事危急，均应各尽己力以救国危，求其可行有效者。如分发‘是中国人用中国货’之条；若分‘排货传单’，须就秘密行之，不可显露面目云云。余谓：此固亦是吾人之职，然最要者，莫如专心求学，蕴养雄厚之势力于方寸，则能明原理而图永久，实真爱国也。”^⑪就杨贤江的性格而言，他不太可能当众说出此话，只能是“窃谓”；但这却是他的真实想法。尽管他也参加过抵制日货的讲演等活动，但他所选定的救国、报国之路，旨在通过教育首先将自己铸造成器，通过完善自我来达成“治国平天下”。

任职南高师后，杨贤江所经历的最大政治事件莫如五四运动。此时他的思想颇有触动，也多有变化。具体说来，“自我实现”由内向的完善自我，转为外向的服务社会、兼善国民；国家观念也明显强化，视共和国之要素为“团体之自动”和“国民间之兼善”；认为“全国国民之能力增进，即为一国力发扬之源”。^⑫但若就总体而论，他似处台风的“风眼”之中，平静而自若，《新教训》一文中的冷峻理念即为明证。他在总结五四运动的局限时，仍归因于：“今日一般国民以未尽受教育之故，不能一致救国。”视今后学生之责任，乃为“辅助教育之普及，使社会上人皆明国家之情、救国之要道”。^⑬这说明，他尽管身处革命的洪涛之中，可教育救国的理念仍然如山岳般坚定。

（四）后期对此期的批判

教育救国论的理论基础，是爱尔维修所倡扬的“教育万能说”。在《新教育大纲》中，杨贤江戏谑地称之为“教育万能教”，并坦然承认自己早年为其信徒：“我当时确是相信教育万能的，以为教育可使人得知识，可使人得技能；更希奇的，是可使哑子开口，瞎子读书。”^⑭由于事实上教育对社会现实的无能，遂使这种信仰破产，并逐渐认识到：“因教育受制于经济，受制于政治，仅靠教育事业上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

的。”^⑭尽管这不能视同于叔本华的“教育无能论”，但称之为“教育效能有限论”却是贴切的。前后的歧异，由此可见一斑。

杨贤江在后期批判教育救国论时，这段话实可视为对早年言论的自我批判：“再有提倡爱国教育的，以为中国之所以衰弱，原于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假如教育上努力宣传爱国思想，使人人知道有国当爱，中国何患不能富强。”^⑮

关于道德教育“新民”说、职业教育“富民”说等等，亦为杨贤江早年思想的基本信条；而“新教育”理论，一概斥之为：“是支配阶级讳言阶级教育的一种遮眼法，是御用学者造出来以自欺欺人的鬼话。”^⑯这种批判，也是相当尖锐的。

至于前后主张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深刻的忧患意识。杨贤江有关教育问题的思索或研讨，均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其次在于侧重教育对改造社会的作用。尽管杨贤江时时以自我完善作为座右铭，但在他后期的思想理论中，却毫无独善其身的气息。另外，对教育所具有的“率先领导或者促进的功用”，在认识上也保持了前后的一致性。

若就总体而言，脉通是潜隐的，次要的；而殊异却是明显的，主要的。正是此，反映了思想的飞跃和理论的进步。

二、教育改造论(1919—1923)

教育改造是20世纪20年代早中期兴起的有代表性的教育主张之一。它渊源于教育救国论，是教育救国思潮的定向延伸。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同中有异：救国论专重教育，改造论兼重社会；“救国”是当面的政治鹄的，“改造”是长远的文化建设；“救国”缘于反帝，“改造”意在反封建；救国论看重观念层面，改造论属意实践层面。任职于南高师后，杨贤江的思想便开始发生变化。负责编辑《学生杂志》后，他便成为教育改造论者，而思想主张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此立论的依据，主要有如下数端。